
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基于武汉市三个典型社区的实证研究

乐章，涂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城市贫困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量了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构成，研究了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匮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相对较高，金融资本得分最低；人力资本对选择就业的生计策略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资本具有反向作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的贫困家庭选择正规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关键词】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生计策略

【中图分类号】 F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5）04—0070—06

一、引言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为我国城市贫困人群的主要群体之一，近年来不断加重的结构性失业更加剧了城市的贫困问题。目前城市贫困人员主要包括城市贫困的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三无人员以及其他外来的农民工和应届毕业生等。^[1]城市贫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于1997 年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此后不断完善和提高保障标准。学术界对城市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贫困的特征、原因和治理等方面。吕红平^[2]从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了我国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问题，认为其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困难性、交融性、多元性和分散性等特性。梁汉媚等^[3]认为我国城市贫困具体表现为收入水平低、食品消费比重大、社会活动少和空间聚集等特点。庞楷^[4]重点研究了城市贫困的社会资本，认为城市贫困人口对社会资本投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学界普遍认为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是我国城市贫困产生的宏观原因。^[5]在城市贫困的治理方面，魏后凯、王宁^[6]提出了“参与式”反贫困的概念，主张借鉴农村反贫困的方法，积极发挥贫困主体的积极性，增强贫困者的自我发展能力。都阳等^[7]重点关注社会救助体系对城市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的救助体系具有较好的贫困救助效率，更好地设计救助方式有助于避免贫困救助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消极效应。

生计（Livelihood）是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等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方式，^[8]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是降低人们生计脆弱性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9]随着国内外对生计问题的深入研究，可持续生计方法作为一种理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贫困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10]逐渐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其中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最为典型，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并通过一个二维平面图展示了各个生计要素之间的关系。^[11]国内学者利用此框架进行了深入分

收稿日期：2015-04-07

作者简介：乐章（1969-），男，湖北英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政策研究。

析，刘婧、郭圣乾^[12]分析了可持续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金融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最大，人力资本其次，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自然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苏芳等^[13]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并进一步研究了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主要显著性因素。

目前有关生计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村地区，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研究较为少见。而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产和社会资产，^[14] 生计资本对人们的生计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武汉市三个典型社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在可持续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现状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情况展开实证研究。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测量

生计资本是人们抵御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重要保证，也是人们选择不同生计策略的重要前提。按照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生计资本划分，可以将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本文在借鉴杨云彦等^[9]和黎洁等^[15]关于农户生计资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城市家庭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其中人力资本的观测指标为受教育年限、身体状况和家庭劳动力占比（即家庭总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比重）；物质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住房面积、住房所有权、对住房的满意情况以及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金融资本的具体观测指标为家庭月收入和家庭存款两项；社会资本则通过户口类型、富裕朋友以及主要求职途径等测量。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方式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并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得到各项指标的相对权重。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4 年 7 月组织的“武汉市贫困家庭生计风险与社会支持”问卷调查，城市贫困群体的特殊性和敏感性给本次入户调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次调查分别在汉阳、武昌和汉口三镇选取了三个典型社区进行入户访谈，其中包括以拆迁还建房为主的新建社区（武昌华腾园社区）、位于城乡结合处待拆迁的综合性大社区（汉阳团结社区）和以单位房为主的城区内老型社区（汉口苗栗社区）。本次调查分别在以上三个社区内各调查了 60 户贫困家庭，共回收有效问卷 171 份，抽样评估表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1 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产测量指标、权重及标准化得分

资产类型	测量指标	权重	标准化得分	资产数值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	0.416	0.553	0.577
	身体状况	0.458	0.566	
	家庭劳动力占比	0.128	0.696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0.231	0.240	0.686
	住房所有权	0.620	0.871	
	住房满意度	0.102	0.598	
	社区基础设施	0.048	0.523	
金融资本	家庭月收入	0.833	0.091	0.092
	家庭存款	0.167	0.098	
社会资本	户口类型	0.096	0.930	0.370
	富裕朋友	0.619	0.181	
	主要求职途径	0.284	0.591	

表1 显示了各类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及其影响权重。在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中，户主身体状况在人力资本中影响权重值最大（其值为0.458），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权重较大（权重值为0.416）；在物质资本层面，是否拥有住房所有权的权重值最大（其值为0.620）；家庭月收入在金融资本中占据较大权重（其值为0.833）；社会资本中权重值最大的为在当地有没有富裕朋友（其值为0.619）。由此可以看出，在城市贫困家庭生计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住房所有权以及家庭月收入和是否拥有富裕朋友对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影响较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水平。

通过各指标的权重值和标准化得分，可以确定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计算出各项生计资本的得分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四类生计资本的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其计算公式为：

$$L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1)$$

其中, L_{ij} 代表第 i 个家庭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X_{ij} 代表第 i 个家庭第 j 项指标实际的变量值, $X_{j\max}$ 和 $X_{j\min}$ 分别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表1 中列出了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通过这种方法, 不同性质和类别的数据均处于0~1 之间, 因而具有可比性。

第二步,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每个城市贫困家庭单项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具体计算公式为:

$$P_{iu} = \sum_{j=1}^n W_j L_j \quad (2)$$

其中, P_{iu} 代表第 i 个家庭的第 u 类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指数 ($u=1, 2, 3, 4$), W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影响权重, L_j 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第三步, 对各个样本的单项生计资本得分进行平均化处理, 以反映城市贫困家庭各单项生计资本的总体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Z_u = \frac{\sum_{i=1}^n P_{iu}}{n} \quad (3)$$

其中, Z_u 表示城市贫困家庭第 u 类生计资本的总体得分水平 ($u=1, 2, 3, 4$), P_{iu} 为第 i 个家庭的第 u 类生计资本的综合得分指数, n 为样本容量。最终计算结果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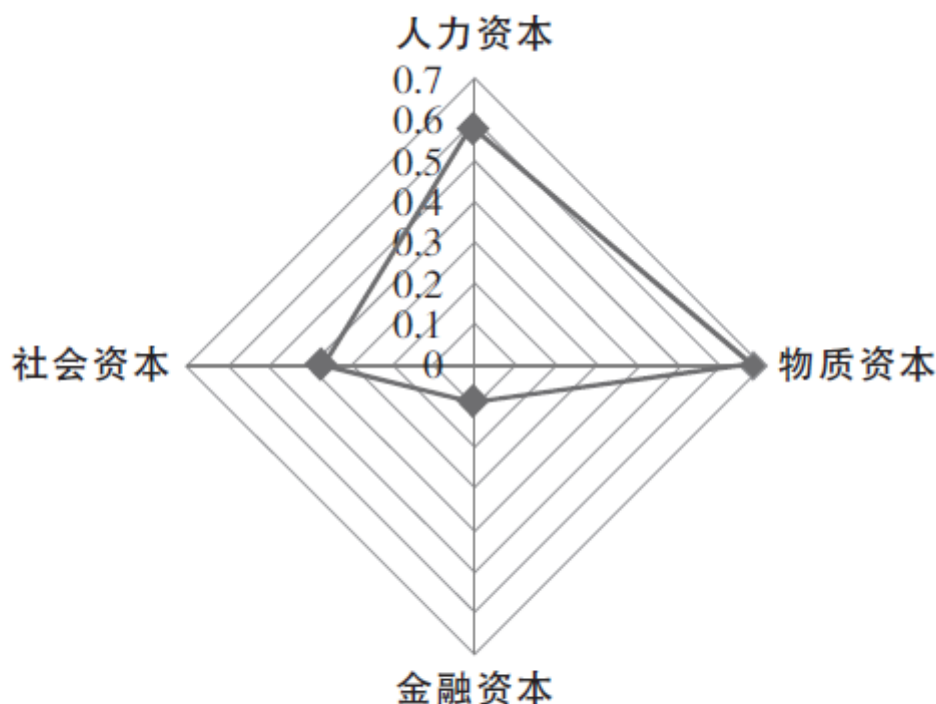


图1 武汉市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值

图1 直观地反映了城市贫困家庭四类生计资本的相对得分情况。可以看出，武汉市城市贫困家庭的物质资本相对得分值最高（其值为0.686），说明武汉市的贫困家庭基本都有住房可住，结合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大部分被调查者都有自有住房，这成为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生计资本的主要构成之一，但其住房面积普遍偏小，住房质量不高，住房满意度偏低；人力资本相对得分值也比较高（其值为0.577），这说明对城市贫困家庭而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较为充分，这成为他们获取经济来源、改善生活水平的有利条件，但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集中在初中，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不足，并且大部分人没有工作，人力资本闲置现象比较严重；社会资本的相对得分次之（其值为0.37），说明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贫困家庭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外部支持与帮助，调查对象多为本地户口，亲戚朋友不少，但大多也比较困难，富裕亲友极少；金融资本的相对得分值最低（其值为0.092），说明金融资本严重匮乏，而城市家庭主要依靠经济收入维持生计，金融资本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其生计困难。其他生计资本对生计的影响体现为先转化为金融资本再影响生计的间接过程。总体来看，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严重匮乏，生计维持非常困难。

三、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是人们为实现生计目标对资产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生计策略。^[13]城市贫困家庭的资本要素极其缺乏，他们只有利用自身劳动力获取生计来源，因此对他们而言，生计策略具体体现为是否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以及采取何种形式就业。鉴于此，本文首先以就业行为作为观测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策略的指标之一（就业=1；无业=0）。考虑到就业形式的多样性，研究对已就业受访者的就业形式进行了深入了解，具体观测指标为“您的工作性质属于哪种”，设置了固定工作（终身合同）、合同工、临时工、个体户等选项。为便于分析，将固定工和合同工合并为正规就业（赋值为1），临时工和个体户合并为灵活就业（赋值为0）。表2 显示了调查地区城市贫困家庭的就业现状。

表 2 城市贫困家庭的就业情况 (%)

类别	是否就业	就业形式
已就业	35.1	—
未就业	64.9	—
正规就业	—	25
灵活就业	—	75

在所调查的171 户贫困家庭中，户主有工作的仅60 户，占被调查对象的35.1%，大部分贫困家庭成员没有就业。已就业的60 户贫困家庭的就业形式统计结果显示，有正当工作的正规就业仅占25%，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成员属于灵活就业，收入来源缺乏可靠保障。

为进一步研究生计资本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情况，本研究先后以就业行为和就业形式两个二分变量为因变量，选取四类生计资本的得分值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二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设定为：

$$\text{Logit}P=\ln\left(\frac{P}{1-P}\right)=\beta_0+\sum_{i=1}^k\beta_iX_i \quad (4)$$

式（4）中，P 代表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实现就业和正规就业的概率， $P/1-P$ 为发生比，可解释为就业的概率与未就业的概率之比和正规就业的概率与灵活就业的概率之比， x_i 为解释变量，具体为单项生计资本的得分指数（ $i=1, 2, 3, 4$ ）， β_0 为常数项， β_i 为回归系数。式中 LogitP 与解释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P 与解释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

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确定发生比 $\Omega = P/1-P$ 的公式：

$$\Omega=\frac{P}{1-P}=\exp\left(\beta_0+\sum_{i=1}^k\beta_iX_i\right) \quad (5)$$

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考察 x_i 变化一个单位对 Ω 的影响。可以将 x_i 变化一个单位后的发生比设为 Ω^* ，于是有：

$$\Omega^*=\exp\left(\beta_j+\beta_0+\sum_{i=1}^k\beta_iX_i\right)=\Omega\exp(\beta_i) \quad (6)$$

式（6）表明，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 x_i 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发生比是原来发生比的 $\exp(\beta_i)$ 倍，即发生比扩大 $\exp(\beta_i)$ 倍，当回归系数为负时，发生比缩小。

根据以上模型设定，利用SPSS19.0 软件进行多元二项Logistic 回归分析，回归过程中自变量的引入方式采取强行进入策略，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 3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

项目	就业行为(参照项:未就业)					就业方式(参照项:灵活就业)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Sig 值	回归系数	标准差	Wald 检验	自由度	Sig 值
人力资本	3.009	1.131	7.071	1	0.008***	3.443	1.824	3.562	1	0.059*
物质资本	0.441	0.814	0.293	1	0.588	2.397	1.810	1.753	1	0.186
金融资本	0.348	1.904	0.033	1	0.855	-1.836	3.894	0.222	1	0.637
社会资本	-3.277	0.857	14.624	1	0.000***	4.260	1.643	6.719	1	0.010**
常量	-1.650	0.966	2.914	1	0.088*	-6.289	2.212	8.026	1	0.004***

注：* 代表 $P<0.10$ ；** 代表 $P<0.05$ ；*** 代表 $p<0.01$ ；Nagelkerke $R_1^2=0.234$ ；Nagelkerke $R_2^2=0.288$ 。

城市贫困家庭就业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城市贫困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就业的方式获取生计来源，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logitP（就业与未就业概率之比）增加3.009 个单位，即可以使城市贫困家庭成员选择就业的发生比扩大20.267 倍。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城市贫困家庭更倾向于不就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城市贫困家庭成员就业的发生比减小0.377倍，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依赖于亲友扶持和社会帮助的心理越强，从而导致他们不愿意通过付出劳动的方式获取经济收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显著性效果不显著，但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将使就业发生比扩大1.554 倍，而增加一个单位金融资本的就业发生比的比扩大倍数为1.416 倍。

已就业城市贫困家庭就业形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家庭越有可能选择正规的工作形式，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力资本能够引起 logitP（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的概率之比）增加 3.443 个单位，即可以使城市贫困家庭选择正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31.281 倍。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贫困家庭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越多，因而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将引起 logitP 增加 4.26 个单位，即可以使贫困家庭选择正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70.81 倍，其原因在于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获取正规就业岗位的途径更多。拥有较多物质资本的贫困家庭越有可能从事正规就业，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物质资本能够使正规就业的发生比扩大 18.859 倍，因为物质资本越丰富，人们的居住生活越趋向于稳定，因而更愿意选择较为稳定的正规就业方式。金融资本越丰富的贫困家庭越有可能选择灵活的就业方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金融资本能够使正规就业的发生比缩小 0.159 倍，其原因在于金融资本越丰富的家庭，相对来说更有资金进行个体经营的前期投入。

四、结论

城市贫困家庭作为城市中的主要弱势群体之一，其生活状况对城市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城市贫困家庭这一特殊群体的生计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理论基础上，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进行了有效的测量，并就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总体匮乏。实地调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水平，身体健康状况也体现为一般，走访过程中发现，相当一部分贫困家庭有残疾家人；物质资本方面，虽然大部分贫困家庭拥有自有住房，但多为房龄较长的单位房，住房面积普遍偏小，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住房满意度低；贫困家庭多为本市

户口，其亲戚朋友也多为困难家庭，富裕亲友极为少见，政府安排是他们获得工作的主要途径；家庭月收入普遍偏低，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救济和低工资收入，家庭存款极少。总体来说，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极其匮乏，生计非常困难。

第二，在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构成中，物质资本得分相对最高，人力资本次之，金融资本最低。大多数城市贫困家庭都拥有房屋产权，但住房质量很低，人力资本得分虽相对较高，但人力资源闲置现象较为普遍，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救济方面，金融资本严重不足是他们生计困难的最直接原因。

第三，人力资本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就业行为和就业方式均有正向的影响。人力资本越丰富的贫困家庭越有可能采取通过就业获得经济收入的生计策略；在就业形式的选择上，人力资本越丰富的贫困家庭成员越有能力获得正规的就业岗位，因而更倾向于正规就业。

第四，社会资本丰富的城市贫困家庭对政府救助的依赖心理比较严重，倾向于选择不就业的生计策略；对于那些选择就业的贫困家庭，他们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从事正规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积极就业应该是解决城市贫困家庭生计困难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难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的不足。人力资本方面，如何通过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个人素质和劳动技能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另外，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政府帮扶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帮扶反而制约了城市贫困家庭就业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政府的救济方式，对于缺乏健康劳动力的家庭，采取现金救助方式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成员，如何将社会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以促进其就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 [1] 梁汉媚，方创琳.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动态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探讨[J]. 经济地理，2011，（10）：1610-1617.
- [2] 吕红平.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J]. 人口学刊，2005，（1）：3-8.
- [3] 梁汉媚，方创琳. 中国城市贫困的基本特点与脱贫模式探讨[J]. 人文地理，2011，（6）：61-66.
- [4] 庞楷.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治理研究[J]. 开发研究，2014，（4）：89-93.
- [5] 刘玉亭，何深静，顾朝林. 国内城市贫困问题研究[J]. 城市问题，2002，（5）：45-49.
- [6] 魏后凯，王宁. 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J]. 江淮论坛，2013，（5）：9-17.
- [7] 都阳，Albert Park. 中国的城市贫困：社会救助及其效应[J]. 经济研究，2007，（12）：24-33.
- [8] Charmber,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 Century [M].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296.
- [9] 杨云彦，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111
- [10] Martha G. Roberts, 杨国安. 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 地理科学

进展, 2003, (1): 11-21.

[1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12] 刘婧, 郭圣乾.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信息熵法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12, (17): 103-105.

[13]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王立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09, (6): 119-125.

[14] Moser, Caroline. The Asset-vulnerability Framework: 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8. 34-48.

[15] 黎洁, 李亚莉, 邵秀军, 李聪.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 (5): 29-38.